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

十八国游历日记
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
藕庐诗草

金绍城 著 谭苦盒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二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十八国游历日记
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
藕庐诗草

金绍城 著

谭苦龠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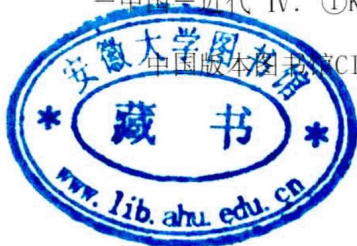
十八国游历日记; 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 藕庐诗草/
金绍城著; 谭苦盒整理.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5.5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2辑)

ISBN 978-7-5506-2131-2

I. ①十… II. ①金… ②谭… III. ①金绍城(1878~1926) — 日记②监狱 — 调查报告 — 世界 — 近代③诗集 — 中国 — 近代 IV. ①K827=5②D916.7③I22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49270号



- | | |
|-------|---|
| 书 名 | 十八国游历日记
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
藕庐诗草 |
| 著 者 | 金绍城 著 谭苦盒 整理 |
| 责任编辑 | 陆 扬 |
| 出版发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eb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邮编:225008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1 |
| 字 数 | 286千字 |
| 版 次 |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06-2131-2 |
| 定 价 | 45.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4-8586885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
（《文心雕龙·知音》）
今读新编稀见史料丛刊，真有治学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谨书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题辞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金绍城 (1878-1926)

第八次萬國監獄會修正臺灣監獄審判日記

監獄協會會長大隈陸推事 編安全法城
長樂李方 著

命六座
珍莊哥

書記官王桐榮 參校

五月二十五日晴西曆七月一號清晨八句半鐘由京乘鐵路
赴山崎與王君仁山偕行張舟岸時山二君送玉車站
車中過嚴又波朱都若張井葉別實察波公予病日不
能現者與王陸先生談談先生稱中國司法前途頗悲觀之
不當從道倫上言女人之善惡先當從法律上論女子之由立
合之與裁判官在少以鈞拒之使可憐女用內曲直可以上下
女中不察情以平裁判官之資格焉於成乎又謂

萬廬詩草

吳興金城拱北

遊意大利邦渾故城

劫運滄桑感昔年
頽垣敗壁認依然
萬家燈火今何在
荒草斜陽古道邊
清歌一曲坐聽時
拾級層臺似半規
千五百人齊鼓掌
珠喉聲轉出簾遲
井眉鉅甕短牆遮
十字街頭賣酒家
想見胡姬招客飲
當爐亂插滿頭花

《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勛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序 一

由金绍城著述的《十八国游历日记》(又名《十八国游记》)、《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两书被纳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由苦盒先生承劳点校。苦盒先生自谦仁让,校毕后嘱余为之序,以彰其由来、背景和价值等。顾两书薪传之苦辛,余自忖却之不恭,故而允诺为之。

多年前为研究清末以来的中国监狱学术史,余曾据《考察各国监狱制度纪要五种》等资料,就清朝派员参加1910年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第八届国际监狱大会(时译为“第八次万国监狱会”或“万国监狱改良会”等)及其有关人员考察各国审判监狱情况在拙著《中国监狱学史纲》第三章有过专节述评。其时,余对《考察各国监狱制度纪要五种》之一的《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留有较深的印象。《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系金绍城、李方共同署名(实为金氏一人之作),经王树荣参校,由时任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王元增交予该监狱内设的囚犯印刷厂印行。该书依据考察顺序和国别,对日本、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那威(挪威)、瑞典、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等十五国三十六所各类监狱、感化院和十四所法院或警察机构进行了逐一的调查记述,其中包含了一手的见证资料,对于了解彼时外国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法院审判和监狱行刑的制度状况、研究国人的比较文化心态与见识等均具有重要价值。不过,可惜当年余未曾得见金绍城对考察行程亲历记述的《十八国游记》。此番阅后始知,作者金氏凭其学脉、才情和见识,在日记中不仅大量

记述了欧洲各国的公序良俗、政事民风、人文博物、轶闻趣事等，也留下了未曾录于《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却与之相得益彰的众多补叙，故此书对于丰富后者的认识具有不可忽视的参鉴意义。

从专业角度看，由官方派出法律界人士对西方刑事审判与监狱行刑状况进行专题调查，此前虽已有 1906 年由刑部派遣董康等人赴日所作《调查日本裁判监狱报告书》、《监狱访问录》等文献，但其对象只限一国，考察范围和比较视野也远不及金氏等人的调查所得。1900 年以前虽不乏政商人士如王韬、李圭、郭嵩焘、薛福成等多人往游西方诸国，偶尔涉足参观审判监狱等地，但因非为考察主题，故仅存观光印象之片言只语而已。以余观之，金氏等人此行的专门考察成果可以说明，为改良本国司法与狱制以期收归治外法权，清廷司法部门对于西方司法与监狱制度的关注与借鉴，已非单一囿于日本而有意扩展至欧美诸国。彼时留下的这些专业历史文献，对于今日之中外刑事司法制度比较研究，尤其是中西法文化关系中的比较狱制和比较监狱史学研究，诚可谓必备之参考资料。

此外，还须顺带提及两书因下述缘故更显珍贵。1910 年 9 月，第八次万国监狱大会预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依照惯例，各成员国只需派赴一个代表团与会即可。但不知何故，清廷却派出了两路人马，即由大理院奏请特派金绍城、李方为专员，王树荣为随员的一路，而法部则奏请特派徐谦、许世英为专员，沈其昌、罗文为随员，王元增为自费编外随员的另一路。两路人马不仅分途与会，而且各自考察欧洲各国监狱及审判制度。“金李诸公先美而欧，许徐诸公先欧而美”（详见《考察各国监狱制度纪要五种》王元增序）。此行所得全部资料，前者经王树荣编订，集成《考察各国监狱制度纪要五种》，内含“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报告提要”、“第八次万国监狱协会报告原本”、“考察各国监狱制度报告书提要”、“十五国审判监狱调查记”、“各国监狱制度译略”等五个部分。后者归国后除向清廷提交了“法部奏派赴美万国监狱改良会徐谦等回京报告摺”，其它调查资料却因故毁于

一旦。王元增有“次年春，审检两厅失慎，行囊书箧悉付焚如”（同前注）的叙述。此后直到 1914 年，王元增于某日忽闻王树荣业已编成上述五种资料，于是“不禁狂喜，乃亟付京师第一监狱重印出版，以补元增之隐憾焉”（同前注）。由此可知，上述成果之由来亦属不易，吾侪接手传承之责，岂有不惜之理乎？！

谨此，余略陈两书之况味如上，以复序命。

郭 明

序 二

有西方哲人说，观察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最好的地方是监狱（大意）。其潜台词是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待犯人都能讲人权，维护其做人的基本尊严，对待其他国民自然也就不会差。这话显然具有一定的道理。

中国传统司法和狱政制度源远流长，且自成一格，但毕竟属于古典典型的。就审判而言，存在着司法人员非专业化、审理过程重口供轻证据等问题，易成冤案；而整个社会对监狱的要求则更为简单，只要人犯跑不了就行，至于人犯在监狱中活得如何，则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受此观念影响，中国传统监狱条件简陋，狱政管理更是落后，其情状让人“闻之不寒而栗”。

然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好动的西方人先是发明、改进了器物和技术，让世界连成一体，中西方的交往成为现实。又通过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为人类的进步指明了另外一种方向。远道而来的西方人对于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诟病颇多，不愿也不想受此约束，最终通过不平等条约确立了领事裁判权，即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一旦成为民刑案件的被告时不受中国司法管辖。受此刺激，中国决意仿效西方推行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派天津知府凌福彭到日本考察司法和狱政，清廷亦派刑部官员董康、王仪通等东渡扶桑再度考察，留下了著名的考察报告。为求谨慎，清廷于北京、天津、奉天等地以西法进行尝试，仅数月便卓有成效，现代文明之光终于穿过了中国厚